

第一章 清帝国的危机

●危机四伏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1838年12月26日）清晨，寒风料峭的北京城还笼罩在晨雾之中，紫禁城内一片昏暗，却又处处显得肃穆、沉静。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清皇家御林军的甲冑和刀枪在昏暗中闪着寒光，侍卫手持带豹尾纓的长枪，腰佩仪刀，排列在乾清宫门前。

清朝乾清宫的侍卫照例是由上三旗的人，即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人担任。

随着一声响亮的传唤声：“湖广总督林则徐上殿。”只见身着一品朝服的林则徐庄严地向乾清宫走去。他右手紧握胸前的珊瑚朝珠，尽量地不让它发出声音，左手则提住朝服，一步一步地登上乾清宫台阶，跪伏在皇帝宝座的下面。

道光皇帝高高地坐在宝座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位远道而来的湖广总督。

宽大的乾清宫内，空空荡荡，只有道光皇帝和林则徐，显得格外静寂森严。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

这是道光皇帝在十一日卯刻的第一起召见。皇帝召见臣子也叫陛见，它包括引见和召见等多种。所谓的“引见”，就是由太监领着在乾清宫或太和殿的殿阶下远远地传唤一下，然后由太监唱个姓名、籍贯就算了结，一批引见的人常是数十人之多。所谓的“召见”又叫“叫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皇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面对面商议军国大事，因此又叫“应对”。召见的次序和时间都由皇帝决定。

道光皇帝此次召见林则徐，准许他跪在毡垫上，垂询达三刻多。涉及的事情几乎全是关于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和如何禁烟之事。

道光皇帝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把林则徐在九月所上的主张严禁鸦片的奏折里提出的禁烟办法和措施几乎是默记了下来，并对林则徐所提出“若泄视之，则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筹饷之银”等语大加欣赏，用笔圈了又圈。对于皇帝垂询，林则徐是极其谨慎的，在从湖北赴京陛见的一个月旅程中，他反复思考了一些深刻见解，几乎都是

字斟句酌的，因此他奉答的话是平静的，措施却是十分强硬。

道光皇帝在第二、三天又召见林则徐，垂问达两刻之久。经过三天的召见，道光皇帝显然已喜欢上了这位为官清廉的南方汉人，他突然地问：“卿能骑马吗？”

林则徐微微一愣，立刻答道：“臣略会。”

道光皇帝高兴地说道：“传谕，让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

进入紫禁城，文官必须下轿，武官必须下马，这是清代的一条规定。准许臣子在紫禁城内骑马，这是清代皇帝赏赐臣僚的一种荣誉。林则徐在当天的日记里激动地写道：“外僚得此，尤异数也。”

第四天寅刻，天刚蒙蒙亮，林则徐骑马见道光皇帝。面对一排排门卫，林则徐心里忐忑不安，他惟恐一不小心从马上摔下，因此，他紧紧地抓住缰绳。道光皇帝望着这位典型的南方人亲切地说道：“卿是南方人，不惯骑马，明天可坐肩舆。”肩舆就是轿子，在紫禁城里坐轿进宫见皇帝，这更是一种荣誉。此时，林则徐的心情十分激动，然而更使他激动不已的是，道光皇帝在当天宣布：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自此之后，道光又先后四次召见乘肩舆而来的林则徐。前后加起来，林则徐此次进京陛见，一个月

之中，道光皇帝先后召见共八次。

道光皇帝如此隆信眷顾林则徐，这几乎是清初以来“前所未有的旷典”这八次不同寻常的召见几乎都是围绕“鸦片”问题而展开这一历史决策可以说关系着大清帝国的历史命运。它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从 1644 年清军入关开始算起，到了道光时期，大清王朝已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整整五朝，已近二百年。此时大清帝国危机四伏。

在清代的皇帝中，乃至整个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中，道光还算得上是一个兢业守成的君主。他饱读诗书，恪守古训，兢兢业业，老成持重，试图用传统的方式来治理大清王朝，并以同样的标准来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他力倡“天下俭为先”的做法，曾为不少人称道。据说，他平时所穿的套裤，当膝头破损时，常令人缝一圆绸盖住破处，时人称为“打掌”。道光则被人称为“补丁皇帝”。平时，他的御膳一般不过四样菜，并规定非庆典不得食肉，甚至在为皇后做生日的千秋节上，有幸赴宴的王公大臣每人也只得一碗带肉片的打卤面。他对皇子、公主的婚嫁费用也有规定，如五公主下嫁时，总计各种费用也不过 2000 两，这在当时清皇室和王公大臣中是颇节俭的。

道光皇帝勤于政务，一生并无显著政绩。在其当政的 30 年中，最为显著地莫过于前期的平定张格尔

之乱。即道光三年他任命长龄、杨遇春等人率清官兵共达 3 万人 在新疆平定张格尔等人的叛乱。直至道光八年将张格尔解京处死，可以说是道光皇帝一生中最为光辉时期。

然而在其当政的后期，麻烦事日多，整个清王朝到了此时已是江河日下，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文化科学不发达，社会问题百病丛生。

“将萎之华 惨于槁木”。这是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形容道光时期社会的名句，可以说它也是道光时代的一个写照。

就全国的总体而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构成了道光时代的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仍有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封建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所需农产品，而且还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尽管在国内的东南沿海一带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缓慢，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据《清会典》记载 嘉庆十七年 全国耕地面积约有 788 万顷，其中直接在皇帝、贵族、官府手中的就达 83 万顷，占全国面积的 11%，全国各地的官吏、地主还有大量土地，如大官僚琦善一家就占地 250 万亩。到了道光

时期，土地集中现象日益严重，“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分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广大农民“暖不号寒，半不啼饥”，勉强度日的十家之中亦无三家。

加上此时吏治腐败，买官鬻爵，贿赂公行。买官又称捐官、捐纳。严格地说，捐官制度并非始于清朝，中国古代自秦以来，历代统治者常以筹边、赈灾、军需等捐纳取经费，但多为一时之计，且多授虚衔。然而清代捐纳几乎是与清朝相始终。清初，始只卖虚衔并不授实职，且买官者无俸禄。康熙十三年，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需筹军费，开始授实官，捐纳制度进入新的时期。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国库空虚，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敷出，故大开捐纳。除虚衔外，知府以下实缺也可卖，只要有钱皆可买官。这种捐纳制度内涵的扩大在增加清朝政府财源的同时，也加剧了清代吏治恶化。道光皇帝明知捐纳的弊端，却又不敢贸然废除，他曾多次向有关大臣谈道：“捐纳，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举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辱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嘱咐各省督抚严格考察捐纳的官员，“从严实查”而已。官场的腐败到了道光时期，已成蔓延之势，贿赂公行，政由贿成，贪赃枉法，比比皆是。这既和官员素质有关，也和清代的官俸制度及整个社会风气有关。

清代官员薪水很低，一个七品知县年俸仅 60 两银，连同政府后来发给同年养廉银也仅 250 两左右，即使像军机处的首席领班大臣等一品大员年俸也仅 150 两至 200 两左右，连同养廉银也仅 1200 两左右。这点钱既要养活官吏自己一家，还要供养官员的私属，如一个知县上任，必须自己招募三位师爷——刑钱、书吏、教读等以及部分家人，总数达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这些钱必须从县官自己薪俸中开支。这对年俸仅数十两至一二百两银子的知县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清官也不够自守。地方官勒索贪污最厉害的是“火耗余羨”。所谓“火耗”就是地方官征收地丁银时，将零碎的银子按一定成色铸成整块交国库，这中间所有的损耗允许地方官提取一部分作为养廉之银。所谓“余羨”则是地方征税后在仓储和漕运过程中的损耗。这种损耗允许地方官在地方征税时按一定比例增加浮税，以弥补损耗，而地方官员借此肆意加大税收以肥私囊，并巧立各种名目，敲榨勒索。

地方官员从勒索中所得的好处，除自己享用外，还须为保住自己的位子而孝敬顶头上司。其中在夏天时的馈赠叫“冰敬”、“瓜敬”，冬天则为“炭敬”。京官外放要向原上司送“别敬银”。京官出差外地要索“程仪”。此外，下级还须向上级按各种年节、寿诞等送“节规”、“礼规”等。这些其实都是变相贿赂，用以“通声气”、“保位子”、“求升擢”和“以幸提挈”。京官、

外官，上级、下级 互有乞求 因缘为奸。

清代中晚期著名的思想家冯桂芳曾说：“廉者有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曾在道光年间任陕西粮道的扬州仪征人张集馨 在其自编的《椒云年谱》中曾提过这种情况：

“将军三节两寿 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 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 水礼两色。八旗协领八员 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两石。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 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陕西粮道出京留别 共费一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件，尚不在其内。”

整个官场每天送迎客人 吃喝不停。还是以上面所说的陕西粮道张集馨为例，“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 上席五桌 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 中席亦必鱼翅海参”；每次宴会 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 总在二百金 仪程在外”；大宴则无月无之，小宴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乎无日不花天酒地”。

地方官如此，督抚及中央大吏也如此。

闽浙总督颜伯焄，革职后回广东原籍，途经潮州，其随带物的过境扛夫多至六七百人，一连十天才将其随物扛完。其家属、随从、差役、仆从、抬夫等几千人，分住寺院及各歇宿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一住五天，实用去银两万余金。

与此同时，清王朝军备空虚，装备落后，士气颓靡，风气日坏，曾经驰骋疆场、剽悍威武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经过近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已成了个空架子，作战能力衰弱。

清代八旗兵、绿营兵是清王朝的两支主要武装力量，属于经制兵，其中八旗兵入关后即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主力驻扎京师，建起京营各部；其二是分镇各省为驻防。据道光年间《钦定中枢朝政考》统计，八旗兵的总数为 13.3838 万人。绿营，也称营兵，也是清王朝经制兵，它除京师的五城巡捕营外，遍布各省。《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在道光年间估计全国绿营兵约 60 万左右。如果说八旗兵作为野战部队的设置，是清廷以满族驾驭、控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话，其着眼点是民族问题，那么绿营兵则完全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构成震慑，是阶级压迫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支武装力量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已随着封建统治的腐败而日趋松弛、衰败。

以八旗兵而言，这是清王朝看家的命根子。它是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 1615 年即清朝入关之前已建立，它为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中国起了巨大作用，历代的清朝皇帝都以八旗兵为命脉，给予极大关注，并赋予其世袭制度等种种特权。八旗兵是世袭，子承父业，且享有免差免赋等特权，并有每月固定的俸薪，被称为“铁杆庄稼”，八旗兵也就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八旗兵所经战事日少，故士气日低，官兵中颓废已成风气。王公出征畏缩不前，有的以种种托词，如睿亲王曾以“假痘为词”不屑一顾，却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有的公爵吸食鸦片；有的公爵甚至淫其奴婢，不成者以物塞其阴户致死或裸置雪中冻死。杭州将军孚恩除吸鸦片、贪女色外，最好斗蟋蟀，凡善斗之蟋蟀无不重金购买，其癖好影响到下一代，其二子尤甚，孚恩离位之际，竟一再拖延不肯离杭。接任的杭州将军瑞征竟也如出一辙，除吸烟、贪色之外，尤爱蟋蟀，他指定衙门内置几间房专门供养蟋蟀。他还爱猫狗成癖，这些猫狗与瑞将军相处日久，瑞将军吸鸦片它们一旁借嗅，天长日久猫狗也嗜而成习，一天不嗅烟气，便尾巴下垂，精神萎靡，不蹦不跳，眼泪直淌。一天，一只野狗将一只叫琴儿的洋狗咬伤致死，瑞将军悲痛万分，饭茶不香，将狗具棺入殓，请风水先生选地安葬，还将咬死此狗的野狗抓获归案，处以极刑。整个八旗的上层骄奢淫逸，嬉戏享乐，成为风气。到了道光年间日趋严重，贪赃枉法比比皆是。下

层八旗兵吃粮当差，虽有一定特权，如固定俸薪，子承父业，世袭特权等等，其家属为无饷无差的旗民，随着生齿日繁，人口渐多，兵额有限，致使后代多成为“不士 不农 不工 不商 不兵 不民”影响八旗兵的稳定和战斗力。

绿营兵虽无八旗兵的世袭制及一套特权，但此时腐败风气也十分严重，官兵吸食鸦片，开设赌场，蓄娼宿娼，其中最突出的是吃空饷。由于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吃空额来补偿。清代初期，绿营曾公开规定此种制度，此后虽在法令上废除，实际上却禁而不止。曾国藩曾尖锐批评绿营：“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之，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被人讥笑为“纸上军人”。绿营将官多出身行伍，多少有些作战经验，但清朝规定绿营高级将官在战时，往往派文官实任，或简命大将军负统帅之责，这些人往往夸夸其谈，不务实际，这就更加限制了绿营的作战能力。加上军事装备落后，刀枪箭戟还是千百年前的旧传，有的久积武库已锈蚀不堪。

正当整个清王朝江河日下之际，西方世界特别是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迅速发展起来。在欧洲，继 1566 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以后，1640 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首次在欧洲大陆推翻了封建统治，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和资本主

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1775 年 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1776 年 7 月 4 日，发表了《独立宣言》，在反对英国殖民战争胜利的基础上，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1784 年 英国又因瓦特发明蒸汽机兴起了工业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1789 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在欧洲一次最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其影响远及欧洲和全世界 德国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 在一些生产部门和运输行业使用机器，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处于农奴制改革前夕，国内已开始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整个世界范围，欧美资本主义得到了广泛发展。

在欧美各国中，英国是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 英国工业生产突飞猛进。进入 19 世纪后 纺织行业普遍使用蒸汽机。到了 40 年代 英国加工的棉花达 5.28 亿磅，生铁产量猛增为 13 万吨。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也发展起来，1815 年，第一艘机器轮船开始航行，1824 年 修筑第一条铁路，此后轮船、铁路被广泛使用。所有这些都使英国资产阶级在掠夺本国人民和其他殖民地国家过程中得到发展 从而使英国号称“世界工场”年出口总值达 5000 多万英镑，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居首

位。

英国国内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急剧的无计划生产，导致大批产品相对地过剩，从而迫使英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起奔走于全球，到处寻找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掠取更大利润，更好地推行商品侵略。为此他们迫切需要对外扩张以开辟新的市场，而中国则是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英国窥伺已久的目标。

从 18 世纪末期至 19 世纪中叶，英国殖民政府多次用外交讹诈和武装侵略的方式，向中国提出了开埠通商和割让舟山的要求，同时，他们还于 1802 年与 1808 年分别派兵强行闯入中国广东的虎门，进行武力威胁。1825 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加紧压榨国内工人阶级的同时，在国外则疯狂掠夺殖民地，中国就是他们的掠夺目标之一。他们努力推行商品侵略，还加紧进行鸦片侵略，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推动策划大规模的对华战争，阴谋用军事手段来推行既定殖民政策，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1827 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等在澳门创办《广州纪事报》公开鼓吹侵略中国。

183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密派林德绥（化名胡夏米）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乘“阿美士

德”号驶往中国南海，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口岸测绘地形，搜集情报。胡夏米还以此行所得的情报为据，拟定了一个对华作战的建议方案。

1835 年，胡夏米等人还亲自上书英国政府，建议派军舰胁迫清政府，勒索补偿，并订立一份“通商条约”。

1836 年，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同年英国资本家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中国协会”，109 家英国公司和金融界头目参加其中活动，成为英国侵华的重要参谋部。

当然也应该注意的是，当英国在积极策划对华扩张的时候，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也在加紧对外扩张，而沙俄则通过陆地口岸进行对华贸易，不断侵扰中国的东北、西北边境。

● 烟毒泛滥

面对这些咄咄逼人的西方国家，道光皇帝几乎处于一种朦胧之中，他隐约知道一点，却又不了解大势，他似乎有所感觉却又浑浑噩噩，他力图用传统政策来挽救颓败的大清帝国，以整肃人心来解决大清王朝面临的种种危机。其结果却是，既无力解决清王朝内部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也无法遏制来自西方的

种种挑战，无法平息东南海疆日趋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

早在雍正、乾隆、嘉庆时期，西方侵略者就开始骚扰中国的东南边疆，到了道光时期，麻烦事日见增多。鸦片、传教士、大炮打破了东南边疆的平静，引起了种种事端，其中特别突出的是鸦片问题。

鸦片 植物学名罂粟，又叫阿芙蓉，俗名大烟，英文名 Opium，它由罂粟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状体。作为药材，明朝的李时珍在其医学名著《本草纲目》里记载可止泻、镇静、止咳等。但它同时是一种含有大量尼古丁和吗啡，具有麻醉作用的毒品，人一旦吸食上瘾，便难以戒绝，且精神萎靡，骨瘦如柴，丧失体力，甚至毙命。

中国人最初服用鸦片，不是吸而是像吃药丸似的吞服。最迟在明代，西班牙人把美洲产的烟草带到了吕宋（今菲律宾），输入福建，中国人才开始吸烟草。17世纪中叶，荷兰人占据台湾，把烟草、鸦片等混合起来吸食，这种方法传入大陆后，才逐步流行吸食鸦片。

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即以印度和澳门为基地，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数量有限，其后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向中国传入鸦片吸食方法。18世纪初期，英国向中国开始输入鸦片，每年约200箱。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了东印度公司制造和贩卖

鸦片的专利，对中国大量推销鸦片。从表面看，东印度公司不参与对中国鸦片贸易的走私，而只是将制成的鸦片在印度市场公开拍卖，但它实际却是那些非公司船只（散商）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的根源所在。

鸦片贸易在当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 1813 年为例，每箱在印度的成本价是 237 卢比，在印度市场的销售价为 2428 卢比，偷运到中国后，可获利为印度市场销售价的 2—3 倍。英印度政府按鸦片成本 300% 以上税率征税，每年高达 100 万英镑，占了英属印度政府收入的近 1/7。英国方面还将其国内生产的毛纺织品和少量工业用品等推销到中国市场，因中国老百姓对英毛纺织品和工业用品需要量少，因此英国商品长期滞销。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逆差，英国人就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来换取中国的丝、茶、大黄等各种物品。

鸦片像瘟疫一样在中国泛滥和蔓延，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每年至少 200 万两银子。截止道光二十年，有人统计清王朝外流的白银达两亿两之多，造成了国库空虚，国内银价上涨，钱价大跌，引起经济生活的动荡和恐慌。

鸦片流毒问题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从雍正七年（1729 年）开始禁烟，其后乾隆、嘉庆两朝连续实

行禁烟，但却禁而不止。清廷颁布禁止外洋输入鸦片的禁令，其结果是只禁止了鸦片自传统的广州内河入口。英、美各国鸦片商将鸦片船改泊澳门，或者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在广州黄埔私售，这样，鸦片即从澳门、黄埔一带涌入国内。清廷规定的“禁止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却没有杜绝鸦片的输入。外国鸦片烟商、中国烟贩、清朝海关官员以及清朝缉毒的兵丁、清廷官吏等互相勾结，并利用被称做“长龙”、“快蟹”的特制的快艇，武装走私，加速了鸦片的输入。两广总督李鸿宾在指示巡私船收烟贩每月规银 36000 两后放私入口的同时，还不断向道光皇帝上禁烟奏折，他手下的副将韩肇庆以买放为名，每箱鸦片收银 5 元至 10 元。他们有时也拿几箱鸦片呈缴朝廷，以应付和蒙混上司，骗得晋官加级。这种状况到了道光时期更趋公开化。

● 林则徐禁烟

朝野上下关于鸦片问题形成了三派意见，一派以广东士人吴兰修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弛禁，即主张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进口，以增加税收，文武官员和兵丁不准吸食，民间吸食者一概无论；另一派以鸿胪寺卿黄爵滋和湖广总督林则